

卫慧、棉棉、春树、张悦然……
从“70后”到“80后”，
文学新人如何变成了
海内外图书市场哄抢的“宝贝”？

“美女文学” 现象研究

从“70后”到“80后”



邵燕君 著

如果说“垮掉的一代”背后有一套“供选择的制度”，“朋克”之后有一种“不同意”的文化，在以“新保守主义”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大获全胜”的今天，所谓的“叛逆青年”，他们的身后有什么呢？虽然对他们来说，“战死街头”是美的，“朋克服饰”是酷的，但反抗的目标是什么呢？

“美女文学” 现象研究

——从“70后”到“80后”

邵燕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 / 邵燕君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

(文化研究个案分析丛书)

ISBN 7-5633-5448-4

I. 美… II. 邵… III. 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44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541213)

开本：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4.5 字数：75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000 册 定价：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编的话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文化研究在西方历经 40 多年的发展,已然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文化研究方面的著作,既包括理论方面的,也包括大量的个案分析,尤其是后者,无疑从实践上显示了文化研究的成果和生命力,展示了它介入现实、参与政治的巨大学术潜力与学术品格。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既包括对传统经典作品如莎士比亚的再解读、再研究,也包括对电视肥皂剧、广告、流行歌曲乃至酒吧、玩具设计、街头舞蹈、时装表演等现实生活新兴文化现象(大众文化)的分析研究。在西方,如莱恩·昂的《观看达拉斯》、莫利的《家庭电视:文化

权力与家庭休闲》、安·杜西尔对芭比娃娃的研究、格罗斯伯格对MTV的研究等，已经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性成果。可以说，西方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同其理论的发展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文化研究的发展。实际上，没有实践上的个案分析，也不能保证文化理论可以很好地建立起来。

在中国，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刚刚起步，但已显示出其旺盛的学术活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译介西方关于文化研究的著作，并力图在中国的语境中对其作进一步的研究，这就包括具体的个案分析。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仍然比较薄弱，有深度的文章还较少，而专著则根本没有。有些学者虽然已经认识到个案分析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在以前的文艺理论、文化批评以及其他与文化研究相邻的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中，学者们很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大家似乎习惯于传统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所以，大家对个案研究的方法和学术路数仍然非常陌生。这样，非常有必要加强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尤其是要加强对中国文化现象的个案分析。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飞速发展，各种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表演等大众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及时地对此进行深入分析，而传统的分析理论框架与知识结构已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需要从新的视角、从文化

研究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深意。由此,个案分析势在必行。

进行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既可适应文化研究热潮,尤其可以弥补中国的文化研究中个案分析的缺乏,同时也是对“细读”这一良好的学术研究方法的提倡,而这必将促进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文化研究个案分析丛书”必将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既可填补中国文化研究个案分析方面的不足,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更扎实深入地发展。另外,个案分析也是读者喜欢的一种研究方式。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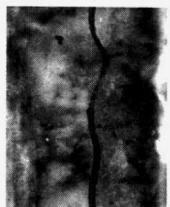
“美女文学”是 20 世纪末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也是“70 后”登上文坛以来对新人写作影响至深的文学概念之一。一个由纯文学杂志推介、扶植的文学新人群体——“70 后”，如何变成了海内外图书市场哄抢的“宝贝”？“美女作家”这个轻佻、暧昧的称呼对“70 后”作家造成了怎样的遮蔽？对“80 后”作家的成长产生了怎样的“引导性”影响？对文学原有的生产机制和新人培养机制造成了怎样的冲击？所谓的“美女文学”是否等同于“时尚女性文学”？在那一副“卖相”的遮盖下，青少年亚文化群体“残酷青春”的面貌如何呈现？这两重文本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复制与转换关系？如此等等。“美女文学”现象蕴含了女性解放与商业媚俗、边缘探索与主流认同、青春叛逆与秩序

臣服等多重内在的矛盾，同时又聚集了文坛与市场、体制内与体制外、文化管理与文化殖民等多重力量的斗争，为我们研究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文学场”的状况，提供了一个错综复杂且生动活跃的个案。

本书的研究方式是以“小个案”解“大个案”。笔者选取了四位作家作为小个案研究的对象，她们是卫慧、棉棉、春树、张悦然。之所以选择这四位作家，一方面是由于她们分别是“70后”和“80后”写作群体中最走红的女作家，并都被以不同的方式授予不同形式的“美女作家”的称号，是作“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不能绕过的对象。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在脉络来看，“美女文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时尚女性文学”和“青少年亚文化文学”两条发展线索，分别以卫慧和棉棉为代表，在“80后”作家中，张悦然和春树可以算作是两条线索的后继代表。当然，这几位作家彼此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复制、借鉴、承续、变异关系，这也是本研究分析关注的重点之一。应该说，后一条选择标准是更重要的。所幸的是，两条标准选择的人选恰恰重合，这给研究带来了方便。而这样的重合也并非偶然，背后有着必然的经济文化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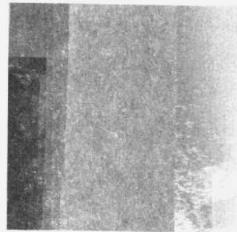
在对小个案的单独研究中，笔者尽可能地贴近作家的个人状况，以求得具体性和丰富性，这也正是个案研究的宝贵之处。同时，笔者在每个个案研究中都贯穿文学生产、女性主义、亚文化研究的视点，以此连通四个具体而微的小个案的脉象，希望这样能够既切实又全面地呈现出“美女文学”这个大个案的整体脉象。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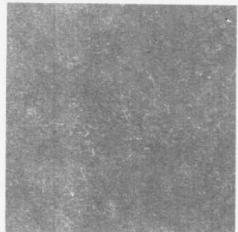


前言/1
一、卫慧：从“70后”领军到“上海宝贝”/3
二、棉棉：残酷以“酷”流行/29
三、春树：由“朋克”而“小资”/57
四、张悦然：生冷怪酷的“玉女作家”/101
结语/129
参考文献/131
跋/135

卫慧：从“70后”领军到“上海宝贝”



卫慧：从“70后”领军到 “上海宝贝”



一、卫慧：从“70后”领军到 “上海宝贝”

1

所谓“美女作家”的创作群体最初在文坛集体亮相是通过“70年代以后”这样一个栏目。该栏目由《小说界》1996年第3期率先推出，随后，《山花》（1998年第1期）、《芙蓉》（1998年第4期）、《作家》（1998年第7期）、《长城》（1999年第1期）也先后推出相关栏目^①。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这些栏目共发表70篇小说，其中近七成是女作家的作品。

该栏目的“首推者”，《小说界》杂志副主编魏心宏在不同场合谈到栏目创立的动机时，都强调“初衷非常单纯”，就是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主潮”、“缺少亮点”、

^① 另外，《收获》、《钟山》虽然没有推出有关专栏，但在这一时期也集中发表了一些“70后”作家的作品。

“缺少大突破”的当代文坛推出新人。他承认，“70年代以后”只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以此界定一个创作群体，是“不合理”的权宜之计，只是借此与以前作家作区分。然而，年龄也构成了这个作家群最大的特点，作为真正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的观念、个性、阅读、语言都与上几代人有所不同”^①。

“70年代以后”这个称谓本来就容易让人觉得是对“60年代出生作家”说法的沿用，从魏心宏自述的编辑思路来看，确实没有提出多少新的理念。“60年代出生作家”也是以年龄为唯一划分尺度的对新一代未成名作家的统称，他们与“前代”作家的区分点也仅在于，他们在“文革”时尚未长大成人，因此又被称为“晚生代”、“新生代”。这也是一个杂志编辑和评论家合力推出的群体，对此作家东西有个十分直截了当的说法：“感谢评论家想了一个‘晚生代’的说法，否则这几十号人如何安顿？”^②在《小说界》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之后，“60年代出生作家”还在集体“汇演”^③。“60年代”还未站稳，“70年代”已然登场，除了让人感叹“代际”更迭之快外，也不能不让人

① 魏心宏：《为什么叫他们“七十年代以后”（代后记）》，见《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纸戒指》，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小说界〉：文学——时代的号角和精神抚慰剂》，见新浪文化独家专访(<http://www.sina.com.cn/s/2001-09-07/3534.html>)《纯文学走向何方——来自20省市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的声音》。

② 徐坤、邱华栋、东西等：《认识晚生代》，载《南方文坛》，1997(5)。

③ 如《北京文学》1996年第8期曾推出“北京新生作家群小说汇展”，所谓“新生作家”基本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

觉得，所谓“70年代以后”大概又是一个编辑想出来的“安顿”新人的说法。

“60年代作家”带给文坛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以“欲望化书写”为核心的“个人化写作”。在中心化价值解体、文化整合功能丧失、“宏大叙事”遭到质疑的20世纪90年代环境里，这种以“张扬个性”、“艺术多元”为旗帜的创作风格，获得前所未有的流行和宽容。它对“个人空间”的呼唤和推崇，实际上参与了解构原有意识形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进程。

评论家吴亮应《小说界》之邀，在为“70年代以后”所写的评论文章中，也从“个人化写作”的角度为其立论，指出在“对时代作全景式描述的野心”已死亡的时代，这些新作家“顺从经验，如实叙写个人生活历程”的写作方式，“哪怕疏离了大众”，也可以达到文学对生活的“对称性”，从而反拨其前辈“对时代整体上的回避”^①。

“60年代作家”和“70年代作家”的最大区别其实是在作家的性别构成上。前者以男性占主体，后者则明显地“阴盛阳衰”。这种“性别构成差异”落实到写作风格上，就使“个人化写作”无可避免地转向为“女性私人化写作”，即女作家写自传性小说、披露个人隐私。

戴锦华在谈到“90年代女性的个人化写作”问题时，曾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积极地肯定其正面意义：“女性对个人生活体验的直接书写，可能构成对男权社会的权

^① 吴亮：《这一代的生活和写作》，载《小说界》，1997（2）。

威话语、男性规范和男性渴望的女性形象的颠覆”，从而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但她同时也指出，这里隐藏着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即女性大胆的自传性写作，会被强有力商业运作所包装、改写。同时，一些批评家，尤其是男性批评家也在暗示，女作家能贡献给文坛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东西是她们披露自己的私生活。“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作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与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反而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①

戴锦华这篇文章发表于1996年，主要是针对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后“女作家创作”被一些书商恶性炒作而发出的批评。此时被炒作的对象是60年代以及更早出生的女作家。今天听起来，这篇文章却像是对“70年代女作家”的预警。这也说明，女性文学的商业化危险一直是内在地存在着的。

《小说界》从1996年第3期推出“70年代以后”，到1998年初其他杂志大规模“跟进”的这一年半中，共发表了9位作家（其中6位是女作家）的14篇作品。其中最早推出的弥红、胡昉和随后推出的棉棉3位作家在此发表

^① 戴锦华、王干：《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载《大家》，1996（1）。

了处女作。绝大多数作品中都包含有对极端的个人隐秘体验,尤其是女性性体验的书写。如姨母与甥女之间的乱伦加同性恋(《红闲碧绿》,弥红,女)、男少年与中年女性的性爱关系(《全部的爱》,胡昉,男)、月经初潮(《艾夏》,卫慧,女)、同性恋及“另类”男女关系(《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棉棉,女)……魏微和赵波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一个年龄的性意识》、《关于性,与莎莎谈心》完全是散文的笔调,可以看作是这一代女作家的性观念自白。

我们很难推测“70年代以后”栏目的推出包含多少商业动机,但此时文学期刊确实已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困境,各杂志都在使尽解数吸引读者。而且这是一个“先有名称、后有队伍”的作家群,发表什么人的作品,推重什么样的风格,编辑的标准和趣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会对正跃跃欲试、急于踏上文坛的“文学新人”形成一个强有力导向。

1998年7月《作家》推出“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下称“女作家专号”),彻底打破了《小说界》至少在表面上尚“平衡自然”的格局。该专号集中推出了卫慧、周洁茹、棉棉、朱文颖、金仁顺、戴来、魏微7位女作家的作品。每位作家的作品前后配发一位著名批评家的点评和作家自己的创作谈。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每位作家名下均配发两三张照片,封二、封三全是这些妙龄少女的玉照,整体排出,给人一种强烈的“美女作家”之感。

事后该专号的策划者宗仁发(《作家》主编)、李敬泽(《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施战军(评论家)谈起筹划经

过时称，它缘起于一次有“密谋气氛”的谈话。虽然在这次谈话里，他们特别推重男作家丁天，称他以优秀的创作而“70年代人”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不会使太多的人对所有的“70年代人”嗤之以鼻^①。然而，在最后出专号时，他们仍抛开了他，以清一色的女作家冲击文坛。

“女作家专号”的推出产生了比《小说界》的“70年代以后”专栏更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以十分感性（虽无明确提法）的方式创造了“美女作家”的概念，使之代替了从前那个中性的“70年代人”。被置于“领军”地位的卫慧在照片下题写道：“穿上蓝印花布旗袍，我以为就能从另类作家摇身一变为主流美女。”李敬泽等人也被媒体称为“美女作家”一词的创造者^②。

如果说《小说界》有意无意地鼓励女作家披露个人隐私的话，“半自传体小说”则是《作家》“女作家专号”的着力点。大量刊登的照片突出的是一种“互文效果”——“女作家的故事”（由传媒传递给读者）和“女作家所写的故事”互为文本。专号封底还特意转载了一篇报道^③，似乎专为导引读者进行这种“互文式”的阅读。该报道称这些年轻的女作家外貌“或清秀或亮丽”，衣着举止更是“处处流露出都市中现代派女性的前卫和时髦”，文风多数

① 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关于“七十年代人”的对话》，载《长城》，1999（1）。

② 见《走进搜狐聊天室》，载《天津青年报·阳光周刊》，2001年11月4日。

③ 邢晓芳：《一批年轻女作家崭露头角》，载《文汇报》，1998年5月21日。